

在菱湖与下河之间——清初文臣孙在丰研究

刘金岁月

(苏州科技大学, 江苏 苏州 215009)

摘要:清代人物研究历经百年积淀已日趋完备,但康熙朝礼部侍郎孙在丰在学界仍长期被忽视,其生平经历、家族背景与科举仕宦生涯均未得到充分关注。孙在丰由科举入仕,成为康熙帝近臣,历任侍读学士、工部侍郎、礼部侍郎等要职,亲历康熙初年诸多政治事件,后因参与治理下河工程,卷入“明索党争”,最终以河工案被罢黜。对这位被学界忽略的清初文臣进行系统考察,不仅可还原其历史角色,亦能以其个人学宦生涯为切入点,为康熙朝政治生态研究增补一处生动注脚。

关键词:孙在丰;下河之争;康熙朝;科举制度;人物研究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5.460

清代人物研究经过百年积淀,已形成深厚的积累,然而学界对康熙初年礼部侍郎孙在丰这一重要角色的关注几乎空白。^[2]孙在丰系康熙九年(1670年)庚戌科榜眼,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因其曾任工部右侍郎,世称“孙司空”^[3],是康熙朝初期重要文臣。作为经筵讲官,孙在丰参与纂修《日讲易经解义》。作为史馆总裁,孙在丰主笔《明史》十七帝本纪。作为治河官员,孙在丰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受命主持下河工程。但这样一位在政治、学术与水利领域皆有建树的人物,却在后世学界研究中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究其原因,一方面孙在丰英年早逝(46岁卒于任),政治生涯较短,经历“河工案”贬谪后,一病不起,没有再次斡旋政坛的机会。另一方面,因牵涉“下河之争”及“明索党争”,孙在丰的著作及史料或被淡化,或散佚难寻。

近年来,《菱湖孙氏族谱》^[4]《孙阁部诗集》^[5]等一手文献的发掘,为深入研究孙在丰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相关文献不仅详细记载其科举、经筵与治河等官方活动,同时包含诗文往来与人际网络信息,由此引出若干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一,孙在丰在竞争激烈的庚戌科中脱颖而出,其借籍应试与受知于谷应泰、颜光敏等细节,可反映清初科举的运行制度以及科举制度的调整适应。其二,孙在丰在“下河之争”中提出“开新不如循旧,筑高不如就低”的治理理念,与靳辅方案形成对比,此主张出于何种目的,值得深入探究。其三,作为经筵讲官,孙在丰的学术活动与政治生涯体现了怎样的联系,与纳兰性德、孔尚任等人的交往又折射出清初士人关系网络的哪些特点。从家族角色、科举仕宦、治理下河与关系交游四个角度进行考辨,通过厘清孙在丰生平事迹与思想脉络,既填补这位被忽视文臣的研究空白,亦探究康熙朝汉族文官的处境与抉择。对其生平进行系统梳理,可以理解清代帝制背景下一位普通中央官僚的复杂性格,有助于从侧面揭示清初政治人物的群体面貌。

作者简介:刘金岁月(2000—),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专门史、江南区域社会史。

通讯作者:刘金岁月

[2] 孟昭信:《罢黜明珠与争取江南士大夫》,北京:《史学集刊》,1990年第1期,24-31页;王英华:《康熙时期关于治理下河地区的两次争论》,北京:《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76-85页。

[3] 上海图书馆、孙在丰、孙人龙:《孙司空诗钞》,上海:上海图书馆,DOI: STGJ032488(索书号:线普407856-59),1746年刻本。

[4] 上海图书馆、孙宪章:《菱湖孙氏家谱》,上海:上海图书馆,DOI: STJP000786(索书号:JP263),1940年。后文简称,民国本《族谱》。

[5] 上海图书馆、孙在丰:《孙阁部诗集》,上海:上海图书馆,DOI: STGJ098330(索书号:线善T10458-59),清康熙稿本。

一、家族角色

在探讨孙在丰的学宦历程之前，有必要厘清其家族背景与世系传承。孙在丰（1644—1689），浙江湖州菱湖人，生于顺治甲申年九月初十日，卒于康熙己巳年六月二十三日^[6]。其生年除载于民国《菱湖孙氏族谱》外，亦与乾隆本《孙司空诗钞》中《庚申生日》诗注“年三十七岁矣”相合^[7]。孙在丰历官吏部侍郎、工部左侍郎，故世称“孙司空”“孙阁部”，著有《孙阁部诗集》七卷。

（一）世系考述

据《菱湖孙氏族谱》所载，孙氏八世祖孙永昌（字怡善）于元明之际迁居菱湖。永昌生元瑞（字伯祥，号毅轩），元瑞生三子，次子孙宾（字孟仪，号灵峰）为孙在丰六世祖。孙宾生四子，幼子孙萃（字时生，号东园）为五世祖。孙萃生五子，第三子孙锡隐居不仕，生孙泳（万历间贡士）。孙泳生懋果（邑庠生），懋果娶施氏，生孙焯。孙焯为郡庠生，原配沈氏即孙在丰生母，早逝，继室吴氏。孙焯生孙在丰、孙在中兄弟。孙在丰凭借科举入阁后，孙懋果、孙焯皆因孙在丰显贵，追赠通议大夫、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侍郎^[8]。

孙在丰共有五子五女。长子笃行（字诚之，附例生），娶严我斯之女，无子，以弟见行长子诒孙为嗣。次子见行（字仕岩，号陟斋，附贡生），原配陈慎旃之女，继娶陈道升之女，生诒孙（出继）、起正；妾杨氏生诒福，张氏生棠。三子学行（字献所，号留甫），娶王揆之女，继娶王睿之女，生诒经、诒武、枝。四子参行（字赞元，号震斋），娶严樵石之女，继娶徐程士之女，生岐、岱。五子载行（字谓兴，号容斋），娶钱闾亭之女，继娶沈寄庵之女，生诒年、诒骏、诒芬、元礼、诒澐、诒谦^[9]。

其世系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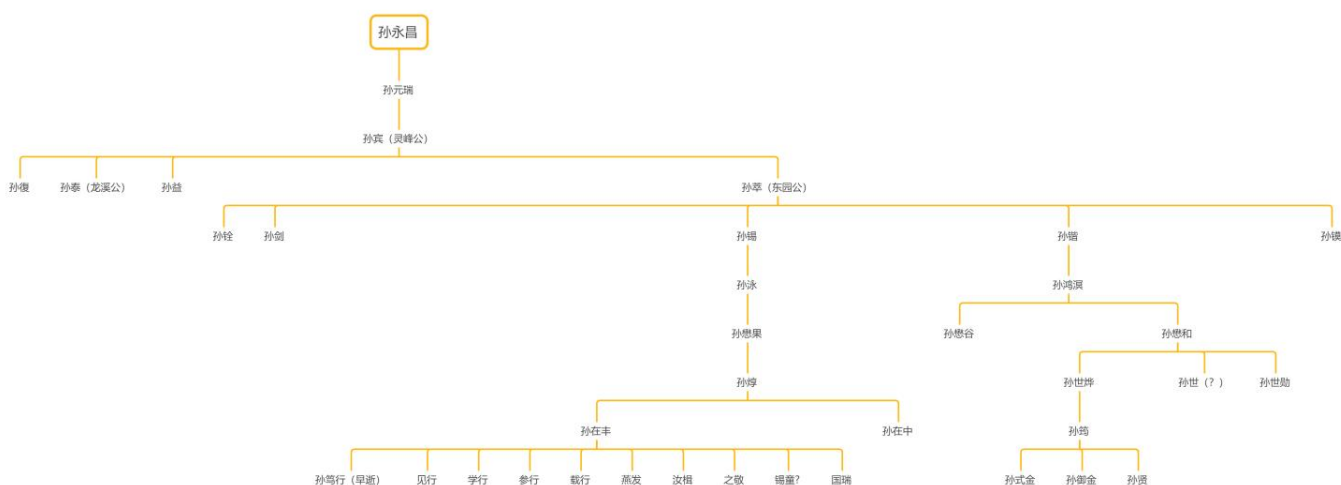


图 1：孙在丰世系考述

（二）家族关系

孙在丰在家族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孙在丰生母沈氏早逝^[10]，其继母吴氏对孙在丰视如己出，孙在丰亦

[6] 上海图书馆、孙宪章：《菱湖孙氏家谱》：“生顺治甲申年九月初十。”同：《孙司空公墓表》亦记载其去世明确日期为康熙己巳年六月二十三日。

[7] 上海图书馆、孙在丰、孙人龙：《孙司空诗钞》：“年三十七岁矣。”

[8] 上海图书馆、孙宪章：《菱湖孙氏家谱》《世系》。

[9] 上海图书馆、孙宪章：《菱湖孙氏家谱》《世系》。

[10] 《菱湖孙氏家谱》《孙司空公墓表》：“方十龄，母沈淑人卒，哀毁动里巷。岁时祭祀，必以虔。”

对继母待如生母。康熙十五年（1676年）孙在丰任侍讲学士，继母吴氏病重，孙在丰乞假省亲，后吴氏去世，孙在丰丁忧三年。

孙在丰在《丙辰予假省亲》中云：

教孝维殷荷圣恩，诏容归省展乌私。

暂辞北阙心弥恋，跂望南云意自驰。

子职拟将臣职书，亲恩得与国恩比。

深惭未易酬高厚，敢向人夸画锦时。

据《清国史·列传·孙在丰列传》载：“（孙在丰）十五年，转侍讲学士，乞假丁母忧，服阕赴京。”^[11]《孙司空行状》的记载可进一步佐证：“丙辰，赠母吴淑人病于家濒危，公闻之即具疏陈情，援六年省亲例，词意恳恻，得请归，公亲调汤药，承意旨，得二人欢，赠母病渐起。丁巳（1677年），遵限出就道，至姑苏，接赠母讣，公奔丧恸毁，苦出三年，哀慕不少减。”^[12]值得注意的是，孙在丰参与家族治理与仕途发展相辅相成。丙辰至庚申年间（1676—1680），在其父孙焯的影响下，孙在丰借丁忧守制之机参与宗族事务建设，主导族谱纂修。据孙焯（孙在丰之父）手书记载：“丙辰大儿（孙在丰）请假省亲，余邀昆弟辈展祭始祖以下先茔”。孙在丰此次归乡之后先后参加宗族祭祀、族谱修订等相关事宜，孙在丰不仅“捐清俸修祠”，更邀集从兄孙淇芳等族人参与修订族谱。孙在丰通过主持族谱纂修工作，逐渐加强孙氏宗族的内部认同，对日后菱湖孙氏家族兴旺、文脉不绝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巩固家族发展，孙在丰胞弟孙在中凭借兄长孙在丰官荫入仕，任中书舍人，并扈从康熙帝“南巡”^[13]。孙在中的文学造诣亦与孙在丰比肩，著有《大雅堂诗文集》，获王士禛、严我斯、徐乾学等十余位当世名士为之作序。菱湖孙氏家族继孙在中之后，宗族子弟持续通过科举应试与恩荫入仕跻身仕途。至乾隆年间，孙在丰的族孙孙辰东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在浙江乡试中举，后又于乾隆壬辰科（1772年）高中榜眼，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自孙在丰至其族裔孙辰东的百余年时间里，菱湖孙氏已在清代前中期的文坛与官场逐步积累起一定的文化影响力^[14]。孙在丰通过修纂族谱、提携胞弟等举措，不仅巩固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同时也反映出清代汉族士大夫多以入仕兴族的途径，实现家族的振兴。

孙在丰不仅在菱湖孙氏家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与妻子吴氏亦展现出伉俪情深，其妻吴氏早亡，孙在丰在其诗集中多有悼念亡妻的诗词，《正月十四日悼亡室忌辰》^[15]便是其中代表，其诗如下：

鼙鼓鸾箫不可闻，春宵寒月白纷纷。

经年长别三千里，回首重泉一片云。

被酒心薰青玉案，归莲泪落锦迴文。

只怜方朔空怀赐，昨岁今朝哭细君。

[11] 嘉业堂钞本《清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12] 《菱湖孙氏家谱》《孙司空行状》。

[13] 《菱湖孙氏族谱》卷四世系：孙在中，邑廩生，康熙甲子廷授内阁中书，历任刑部山东清吏司郎中。

[14] 孙辰东，字枫培，号迟舟，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榜眼，孙在丰族裔，著有《种纸山房诗稿》。因菱湖孙氏在有清一代有两位榜眼，故称孙在丰为大榜眼或老榜眼，孙辰东为小榜眼。

[15] 《孙阁部诗集》《感悼诗》《正月十四日悼亡室忌辰》。

孙在丰对菱湖孙氏家族的兴旺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受父亲孙焯影响，孙在丰先后参与族谱纂修、捐俸修葺宗祠，厘清家族世系，为家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依托仕途优势，他提携胞弟入仕，推动家族从菱湖地方望族发展为科举宦世家，巩固家族在清初江南地方文坛与官场的影响力。其妻吴氏早逝后，他以诗作悼亡，既抒发个人情愫，也践行夫妻伦理、维系家族情感。孙在丰为家族的贡献使菱湖孙氏家族日益兴旺，仕林文脉不绝。

二、科举仕宦

孙在丰的学宦生涯，是清代士人凭借科举跻身仕途的缩影。据载其家族本籍为归安，而《清国史》则称其为德清人，厘清其应试时的真实籍贯，不仅是准确考证孙在丰生平的重要一环，也有助于剖析他及其家族如何借助地缘关系走向仕途。

（一）借籍应试

关于孙在丰籍贯，学界存在两种说法，孙氏《族谱》载孙在丰生于孝丰^[16]，家族自八世祖孙永昌自余姚迁居于归安菱湖镇，故居称“榜眼厅”。然官方史书如《清史稿》《清国史》均载其为“浙江德清人”，形成矛盾。

据乾隆本《孙司空诗钞》^[17]可知：

同郡严宗伯（我斯）存菴先生撰先世司空公行状，公姓孙氏，讳在丰，字岷瞻，系出姚江，家归安之菱湖。

严存菴即严我斯，康熙三年（1664年）状元，严我斯系孙在丰同郡姻亲，因其年龄少长，孙在丰从子孙文龙称其为“宗伯”。由这段记载可知孙在丰为归安县菱湖镇人。至于孙在丰为浙江德清人一说记载见于《清国史》“孙在丰，浙江德清人。”^[18]结合现有两种说法，孙在丰的籍贯为菱湖更为可靠。

清代童试实行严格的州县学额制，归安属湖州府首县，文风鼎盛，竞争激烈；毗邻的德清县学额相对宽裕。孙在丰的早期教育应试正是在归安县菱湖镇学额已满的基础上展开，孙焯为子选择德清学籍，实为应对“额少人多”的务实策略。据《族谱》^[19]中孙焯自述记载，让孙在丰冒籍于德清：

谷公（谷应泰）按湖时童子科额数每县始限十五名，大儿应试德清。

可知孙在丰应试时因归安县学籍满额，所以其父孙焯让在丰借德清学籍参加乡试。类似“寄籍”“冒籍”^[20]现象在科举大省屡见不鲜，如江苏吴县与震泽、浙江仁和与钱塘等。孙在丰的籍贯问题，实为清初科举制度下“学额竞争”的缩影^[21]，该案例揭示了精英家族为应对“学额已满”的情况而通过“冒籍”参加科举。

（二）从神童到榜眼

孙在丰少年于湖州府学习，后参加浙江童试，时任湖州知府刘会铨、浙江学政谷应泰对孙在丰颇为赞赏。孙

[16] 上海图书馆：民国本《族谱》，孙焯（孙在丰父）手订：《建祠纪略》：“甲申九月，得长子，因生于孝丰，以在丰名”。

[17]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一六三卷，《孙司空诗钞》《行状》。

[18] 中华书局、刘承幹：《清国史嘉业堂钞本全十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19] 上海图书馆：民国本《族谱》，《建祠纪略》。

[20] 刘希伟：《清代科举冒籍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系统考察了清代科举的分区定额、原籍应试原则与变通、冒籍的类型、成因及影响，并探讨了其治理制度与效果。

[21] 梁志平：《定额制度与区域文化的发展——基于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学额的研究》，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清代学额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梁志平研究指出：清代奉行“科举必由学校”，而入学的关键受限于“学额”。学额作为国家在地方分配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的手段，是清代一等重要社会资源。本书揭示了制度的运作规律，如恩广、捐广等扩充方式，应对行政区划变动的调适，以及通过分析“寄籍”“冒籍”等现象所展现的学额与社会流动的复杂关系。

在丰在少年之时便颇为聪颖:

成童有大志, 博涉经史, 寒不炉, 暑不扇, 鸡三号即起, 就业至夜分不辍。为制科文, 千言立构, 不雕琢而自完美。试于郡太守刘会铉, 公首选, 一见器重, 曰: 此玉堂金马人物, 非培塿材也。撤贮水珍器以授之。人以刘公为知人。学使者丰润谷霖仓公阅公牍拔童子第一, 语人曰: 余两试东西浙所得最奇士莫及孙子者, 盖目中未见其匹也。^[22]

孙在丰于康熙二年(1663年)通过乡试, 目前关于孙在丰中举科目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以《易经》中举, 第二种是以“义经”中举, 据《族谱》记载:

德清庠生, 以《易经》中康熙癸卯浙江乡试二十三名举人。

但据乾隆本《孙司空诗钞》所记:

癸卯以“义经”得隽。

《族谱》中称《易经》而《诗钞》称“义经”, 孙在丰乡试科目究竟为何? 据孙在丰与牛钮所著《日讲易经》^[23]可知, 孙在丰应于幼时通晓《易经》, 并对《易经》有极深刻独到的见解, 故孙在丰乡试题目应指《易经》, 而“义经”一词应为同音致讹。

康熙八年(1669年), 孙在丰准备赴京参加应试, 随其房师颜光敏学习, 备考进士, 根据乾隆本《孙司空诗钞》见《题修来先生藤阴读书图十韵》^[24]:

束发受六经, 抗志昔先觉。沿流荡无垠, 何处寻其乐。吾师颜夫子, 万古心胸拓。好学合前轨, 绍闻综博约。乐圃罗群书, 藤阴森覆阁。恍若游具茨, 大隗恣磅礴。侍史获芸香, 手中尽丘索。力足穹穹皇, 何况于濂洛。带草经春长, 不殖将终落。顾言披此图, 结根从所托。

在此十韵诗中, 孙在丰落款“颜老夫子郢削, 门人在丰具稿。”在此韵诗中, 情感真挚而辞气恭谨, 既体现了孙在丰与其师颜光敏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 也折射出孙在丰年少时的求学经历。颜光敏于康熙六年(1667年)中进士后, 常居京师, 因而孙在丰随其学习之地, 当亦在京城^[25]。

康熙九年庚戌科殿试, 共取进士二百九十二人, 蔡启傅、徐乾学、孙在丰等人皆名列其中。尽管该科殿试孙在丰的策论原文今已不存, 然从次年康熙帝特命孙在丰等人赋诗应制一事可知, 其文学才华在当时已受康熙帝青睐。^[26]孙在丰中进士后不久即授内国史院编修, 正式开启孙在丰仕宦生涯。

(三) 日讲官与经筵侍从

孙在丰中进士后得以迅速进入康熙朝权力中枢, 孙在丰任内国史院编修后, 旋即任康熙帝“日讲官”。康熙十年(1671年)“设日讲官, 与蔡启傅互补”^[27], 孙在丰日常为康熙帝讲论经史。日讲官需要“学问淹通, 言行端谨”, 孙在丰凭借其《易经》专长入选。孙在丰任“日讲官”颇久, 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升任翰林院

[22]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清代诗文集汇编》, 一六三卷,《孙司空诗钞》《行状》。

[23] 赫舍里牛钮、孙在丰等:《日讲易经解义》十八卷, 清康熙二十三年内府刊本。

[24]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清代诗文集汇编》, 一六三卷,《题修来先生藤阴读书图十韵》。

[25] 明会试、清会试及乡试, 十八名同考官分房批阅五经试卷, 故称“十八房”。至乾嘉时期, 则形成以翰林院编修、检讨及其他进士出身京官充任的定例。参阅《清史稿·选举志三》, 顾炎武:《日知录·十八房》:“今制会试考官二员总裁, 同考官十八员, 分阅五经, 谓之十八房。”; 赵翼:《陔馀丛考·十八房》:“本朝会试及京闈乡试, 所用同考官凡十八员, 谓之十八房。”

[26] 见清康熙本《孙阁部诗集》:《辛亥二月十八日召见弘德殿命和早朝诗一律》《命赋长松瀑布图二绝句》《命赋西伯过太公图二绝句》。

[27] 戴璐:《吴兴诗话》, 湖州:民国刘氏嘉业堂刻本, 卷二, 二十七:“康熙辛亥初设日讲官, 以严我斯、蔡启傅、孙在丰补充见吏科录书。”

掌院学士时，仍“充日讲起居注官，经筵讲官”，可见其深得康熙帝信任。康熙十一年（1672年）扈从汤泉期间。据《族谱》《公墓表》记载，“一日扈蹕南苑，命公射，一发获獐。上喜谓近臣曰：‘孙在丰文武才也’”。这一“文武才”的极高评价，直接促成了孙在丰以文臣身份出任同年顺天府武乡试的正考官。随着其地位巩固，荣誉与封赠接踵而至。康熙十四年（1675年）孙在丰升任侍读学士时，孙在丰父母亦依制获敕封为奉政大夫。

在翰林院供职期间，孙在丰因学识渊博、言行端谨，被擢为日讲官，常侍康熙帝左右，又因稍长于康熙帝渐得康熙信任与赏识。孙在丰凭借科举跻身仕途，日讲官与翰林院的任职经历，不仅依托其经史学识，亦为他参与官方文化工程、拓展涵盖朝野名士与江南耆宿的交游网络提供了契机。而孙在丰的治学与交游，均与自身科举学宦历程相呼应，孙在丰所秉持的经世致用之学，既体现在这段学宦交游中，也为日后参与河工事务埋下伏笔。

三、治学与交游

孙在丰的交游以仕宦经历为基础，其好友涵盖纳兰性德、孔尚任等文学名士及其家族，孙在丰的交游网络一方面折射出自身的康熙近臣身份，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孙在丰在学宦经历中积累的政治资本。

孙在丰的学宦生涯紧密围绕清初两项重要的官修文化工程展开。康熙十九年（1680年），孙在丰与满族学者牛钮奉旨参与纂修《日讲易经解义》，历时三年余，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成书。

在任《日讲易经解义》纂修官的同时，孙在丰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出任《明史》总裁，负责纂修明史本纪部分。据孙在丰《公墓表》载：“一十七帝本纪俱出公手”，足见其在修《明史》时承担重要角色。孙在丰在修史过程中注重考辨实录，去芜存菁，秉承严谨的史学态度。然今已难觅孙在丰手定《明史·十七帝本纪》原稿，实属遗憾。从孙在丰在《日讲易经解义》与《明史》纂修中的贡献不难看出，其学宦生涯与清初政治文化建设的关联。孙在丰通过解《易》为康熙帝立政统，通过修史为清王朝正名分，孙在丰的学宦实践始终服务于经世致用的现实目标，成为康熙朝文化整合与意识形态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

孙在丰的文学交游网络亦反映了清初文坛的特点，在孙在丰的交际关系中，与纳兰性德、孔尚任的交游尤为突出。孙在丰扈从康熙东巡关外期间与纳兰性德相识，二人虽身份各异，一为深受重用的汉族文臣，一为满洲词坛翘楚，却因诗文唱和结下深厚情谊。纳兰病逝后，孙在丰所作《挽成容若进士四首》^[28]不仅表达了个人的悼念之情，其中“奏入明光秘，旋请绝域晔”一句，暗指纳兰性德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侦视索伦部落后，曾密奏推动雅克萨用兵之议，为清初边疆经营史提供了珍贵的旁证，亦体现出孙在丰诗词以诗记史，以诗交友的特点。^[29]

与孔尚任的交往则展现了孙在丰文学活动与河道治理实务的紧密结合。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孔尚任因御前讲经受赏识，而孙在丰时任日讲官，二人同随康熙帝南巡。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下河工程启动，孔尚任被派随孙在丰协理河工，孔尚任《湖海集》中多首描写运河区域的诗作，与孙在丰的忧民之叹形成呼应。这两段交游不仅丰富了孙在丰的个人生命历程，更成为观察康熙朝文臣网络中诗文往来、政治参与交互的鲜活个案。

在孙在丰致力于官方学术体系构建的另一面，是其对前辈学人，特别是江南文化名宿的深厚尊敬与跨越政治立场的交往，亦反映了孙在丰作为文臣所秉持的文化情怀，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清初严峻的政治藩篱。孙在丰虽贵为康熙近臣，身居内阁，却并未因此刻意疏远那些具有前朝背景的学者。他与明末清初著名的史学家、曾仕南明的李清，以及名满天下的遗民学者冒襄等人，均保持着诗文唱和与往来^[30]。

这类贺寿诗词并非简单的文酒应酬，而是在清初“遗民”与“新朝文臣”身份矛盾未消之时，一种尊敬耆宿

[28] 上海图书馆：清康熙本《孙阁部诗集》。

[29] 周青民、黄馨慧：“纳兰性德与东北”研究综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1-7页。

[30] 上海图书馆：清康熙本《孙阁部诗集》：康熙二十年辛酉《寿李映碧先生八十》；上海图书馆、冒襄：《同人集》，DOI：STGJ042967（索书号：线普长 000643）卷十二，收录孙在丰《丁卯春日寿巢翁先生》。

的包容姿态。孙在丰在履行其官僚职责、服务新朝的同时，内心依然恪守着士人群体基于文脉与诗文的认同，试图在政治认同之外，维系一个以文人为纽带的、更为广阔的士林交际圈。这使得孙在丰的形象超越了单纯的“文人官僚”或“康熙近臣”，体现出其性格中更为复杂和富于人情味的一面，也为理解清初士大夫在王朝鼎革之后如何平衡政治身份与文人关怀，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注脚。

孙在丰由翰林院系统转任工部侍郎，开始参与实际政务，后受命协理下河工程，成为康熙朝治河事务中的重要官员。这一身份的转变，既是孙在丰仕途的重要转折点，也使其卷入了“下河之争”。

四、人生转折——下河之争

孙在丰的仕途转折，正始于他由翰林官转而参与下河治理。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上疏弹劾靳辅堵修高堰、高邮一带工程，由此引发一场关于下河治理的争论。康熙二十五年（1686），下河地区水患日趋严重，孙在丰因深得康熙帝信任，被派往主持下河治理，正式承担起疏浚督导、统筹河务的重任，也由此从专攻经籍的文臣，转为直接参与黄河治理的官员。

（一）治理下河的背景及争端

下河地区在清代主要指江苏境内的山阳、高邮等七州县，地形低洼如釜底，易积水成灾。该地区水系复杂，上游的洪泽湖承接淮河来水，若因淤塞或洪水导致清口泄流不畅，湖水便会东注高邮、宝应等湖，继而淹没下河州县。该地区水患根源于黄河长期夺淮入海，导致淮河下游淤积，淮水汇聚于洪泽湖。明代潘季驯采用“束水攻沙”、“蓄清刷黄”之策，修筑高家堰，迫使淮水尽出清口。此举虽开启治河新阶段，但也使淮水在清口受黄河顶托时更易东溃下河。后为保上游祖陵，又实施“分黄导淮”，进一步使东泄淮水常态化。明末清初，下河地区水患愈发严重，河道屡屡溃决。^[31]

康熙十五年五月，淮水冲决武家墩等多处关键堤坝，河道严重破坏，靳辅遂于此危局中出任河道总督。然而其后康熙帝在南巡中亲眼目睹高邮、兴化等地“积水汪洋”的严重灾情后，决意对下河水系进行彻底整治，康熙二十五年特谕工部右侍郎孙在丰专职负责此事^[32]，工程获内帑银二十万两作为启动资金，孙在丰前往下河地区主持治河工程^[33]。

下河治理问题上，孙在丰与靳辅在减水堤坝处置、施工顺序安排、劳工调度方式上方案各异，分歧既关乎技术路径，更体现出漕运优先与民生为本的治河理念差异，具体信息可见下表：

表 1 孙在丰与靳辅治河方式差异

议题	孙在丰	靳辅方案	争议焦点
减水堤坝	关闭高家堰闸坝，防黄水倒灌	保运河安全	泄洪与保漕的优先性
施工顺序	先疏海口	先筑重堤，束水攻沙	治标与治本的理念差异
劳工摊派	严禁州县妄派，寒暑供衣药	征调民夫，摊派工费	民生关怀与效率至上

孙在丰与靳辅针对下河治理提出了不同方案。孙在丰在是否围堰修坝方面，主张关闭高家堰闸坝以阻断黄河

[31] 王英华：《康乾时期关于治理下河地区的两次争论》，北京：《清史研究》，2002 第 4 期，76-85 页。

[32]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六三卷，《孙司空诗钞》《行状》：“丙寅，晋工部右侍郎。”

[33] 蒋良骐：《东华录》，乾隆七年武英殿刻本，卷十三：“孙在丰有才，着发内帑二十万两，前往督修，功若可成，再酌量动支正项钱粮。”

水东侵，靳辅则认为应保留高家堰主要闸坝，仅闭塞下游部分闸坝，以维持运河水量与漕运安全。孙在丰在施工顺序上建议先疏通海口以快速泄洪，而靳辅力主先修筑重堤，贯彻“束水攻沙”的传统策略。孙在丰在是否增加劳役参与治河工程问题上反对随意征调民夫，主张保障民工生计，靳辅则倾向于征调民力以推进工程进度。这些分歧不仅体现为技术路径之争，更反映漕运优先与民生为本的治河理念的不同。

康熙二十五年十月，孙在丰上疏要求尽闭高家堰及上游各坝，以便推进下河疏浚。孙在丰认为，若不闭坝，上河持续放水将使下河工程无法开展。但若闭坝，又恐高家堰堤防承受不住水压而溃决，形成治河困局。靳辅则坚决反对关闭高家堰诸坝，认为这将削弱淮水在清口对抗黄河的水势，导致黄水倒灌、清口淤塞，最终危及漕运命脉。

汤斌上奏支持孙在丰，直指靳辅治河方案的矛盾，高家堰既已加固，就应让淮水全力出清口刷黄，开坝东泄实为“弃利取害”。汤斌认为靳辅所建毛城铺等减水坝的泄水汇入洪泽湖，抬升湖面，反而迫使高家堰不得不放水东注，加剧下河水患。康熙最终采纳孙在丰一方的意见，认为堵塞高家堰可使淮水全力出清口，不致弱于黄河。二十六年正月，清廷下令闭塞相关闸坝。

孙在丰所著治河专论《下河集思录》虽已失传，但从其在治河过程仍可见他以解除民瘼为己任的尽责之心。在汤斌所著《答孙杞瞻开海口治下河书》^[34]可见一斑：

河督（靳辅）之坚执不移者，不过以开闸开坝费帑金无算，今日可塞，昔日何以误开，恐有从而议其后者耳。某因于会议向中堂、九卿言之：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补泄随时，难以执一。不得以后日之用补，归咎于前日之误泄。昔日开坝以保堤也，今日塞坝以刷沙也，犹先应用大黄、芒硝者用大黄、芒硝，后应用参、芪、桂、附者用参、芪、桂、附，各有其宜，归于愈病而已。此言实有至理，亦欲河督开豁疑衷，从长计议，为国计民生图永远之策。此出自诚心，而不谓河督之坚执如故也。

故目下不在减水坝之塞与不塞，而在地方官不肯尽心相助，呼应不灵，人夫物料恐难凑手耳。若诸事凑手，即当尽心严督工程，勿惑浮议。成大功者，小小顺意不足喜，小小拂意不足惧。惟先定成局，持坚忍不拔之志。如行兵然，当有定算，偶有胜负何足忧喜；如弈棋然，当争全局，一著二著何足较量。下河苦水久矣，今岁之旱乃偶然尔。若尽如今岁，则海口可以不开矣。前读大疏，断无海水高于内地之事，此先生亲身阅历之言，故凿凿如此。只此一言，便是治下河定算矣。故减水坝不可塞，则海口更不可不开。下河之水愈大，则开海口之功亦愈大。惟先生断然持之耳，某以为成功可操券而待也。

汤斌对孙在丰的治水方案颇为认可，认为其开通海口的主张顺应“水终归海”的自然规律，可从根本上解决下河水患，而非如靳辅仅依靠上游减坝临时泄洪。他支持孙在丰兼顾民生与国计的思路，以解救七州县灾民为先，同时保障漕运长远安全，契合康熙帝体恤民生的理念。汤斌还指出，孙在丰以实地见闻驳斥“海水倒灌”等不实之说，体现出务实精神，其治水思路切中根本，堪称可行之策。

尽管孙在丰的治河经历因党争而中断，但其所确立的先疏海口的施工序列，包括冈门、白驹等工段的完工，以及丁溪、草堰等工段的中止，均为后世治河工程所借鉴。^[35]

这场看似技术层面的争论，实际是康熙朝治河策略的调整。靳辅方案工程成熟，但侧重保障漕运，对民生有所忽视。孙在丰“循旧道、就近疏浚”的主张，则更贴合纾解民困的道德约束。后续事态发展更值得玩味，靳辅

[34] 贺长龄、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清光绪十二年武进盛氏思补楼重校本，卷一百一十二政工十八。

[35] 傅泽洪、郑元庆：《行水金鉴》，清雍正三年淮扬道署喻义堂刻本，卷百三十七运河水：“臣谨钦遵沿河踏勘，详阅泄水诸口。除庙湾、冈门、白驹三口水颇流畅，无庸置议。”；钱仪吉：《碑传集》，清道光六年刻本，卷四十内閣九卿上：“如《周易》、《尚书》、《四书通鉴讲义》、《扈从笔记》、《东巡日记》、《下河集思录》、《尊道堂诗文集》各若干卷，藏于家。”

主持开凿的中河成效显著，极大便利漕运，康熙在再次南巡后也重新起用他。这场持续多年的下河之争，既体现出清代治河中漕运与民生的政策权衡，也展现了康熙在治理黄河方略之间的调整。^[36]

（二）身陷党争与悲剧结局

下河治理之争在康熙朝很快超出了具体治河方案的范畴，孙在丰因此身陷“明索党争”。河道总督靳辅一度被视为明珠一派，而漕运总督慕天颜对靳辅提出糜费帑金的弹劾，实为针对明珠党羽政治势力的打击。孙在丰因与慕天颜联姻而受到牵连，遭到明珠亲信余国柱等人的排挤。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这场由治河方案不同而演化为党争攻讦的风波最终以双方均受惩处告终，据《清史稿》载，“董讷、熊一潇、靳辅、慕天颜、孙在丰等人俱削官。”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康熙帝也许是因为曾经的君臣际遇，对孙在丰仍有一定回护，并未彻底清算，孙在丰仅被贬为翰林院侍读学士。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孙在丰因被贬谪而日渐消沉，身体趋于恶化，据载其“积劳内伤，且冒毒风湿，中脏腑，精血大亏。”^[37]康熙帝念及旧情于五月复授孙在丰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己巳五月，复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眷礼如旧。^[38]

六月二十三日，孙在丰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享年四十六岁。康熙帝深感痛惜，这位较自己年长数岁的近臣，曾伴随其少年岁月，日侍左右，讲授经史，却在治河期间身陷党争。孙在丰受康熙帝恩旨谕祭，其已故夫人亦被追封为淑人，获准与孙在丰合葬：

康熙之己巳六月二十三日，配瞻孙公以疾卒于官。^[39]

己巳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卒于官，蒙恩驰驿归柩，遣布政司上官谕祭赐葬乌程县永新乡一区二都已面阳山之麓，配吴氏敕封孺人，诰封宜人，累赠淑人合葬。^[40]

康熙帝此举既是对孙在丰过往功绩的肯定，亦折射出康熙帝对其身陷党争、遭际艰难的复杂心境。斯人已逝，康熙帝唯能通过厚恤身后之事，来为这段君臣际会作结。

五、结论——一个被忽视的清初文臣

孙在丰是康熙朝汉族文臣的典型代表，其兼具家族精英、科举名士、治河能臣与学术大家的多重人生轨迹，为考察清初王朝整合期的政治生态、文化融合与士人境遇提供了重要样本。其生平不仅是个人仕途历程，更折射出制度约束与个人选择、技术实践与政治博弈、学术追求与现实处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为理解康熙朝官僚体系运行及汉族士人处世策略提供了关键视角。

孙在丰少年立志科举，在家族支持下入仕，后担任日讲官，治学勤勉，因常侍帝王左右深得信任，成为朝廷重臣。他年长于康熙，曾随驾狩猎展露才干，获“文武才”之誉。其诗词多颂扬康熙帝，虽有溢美之辞，亦体现出他谨慎持重的为官风格。^[41]孙在丰与康熙朝多位重要文臣相交游，相关诗文虽存有应酬之作，却也流露出作为

[36] 王英华：《康乾时期关于治理下河地区的两次争论》，76-85页。

[37] 严我斯：《行状》，收录于民国本《族谱》。

[38] 严我斯：《皇清通义大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前工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配瞻孙公行状》，清康熙二十八年，收录于《族谱》，下文称《行状》。

[39] 邵远平、徐倬、沈恺：《孙司空公墓表》，清康熙三十一年，收录于《族谱》，下文称《公墓表》。

[40] 上海图书馆：民国本《族谱》。

[41] 清康熙本《孙阁部诗集》第一卷《纪恩诗》凡三十六首，第二卷《扈从诗》凡四十四首，前者多记载康熙帝的恩遇与赏赐，后者则详录康熙初年扈从东巡的所见所闻。

汉族科举出身官员的性格特质，处事审慎有度，秉持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

孙在丰的科举仕宦之路反映了清初士人应对学额竞争的调整，在面对归安县学额竞争满员的问题时，其父为孙在丰选择借籍德清应试这一举措既反映出学额竞争对士人命运的制约，也展现出江南仕宦家族在科举制度框架内寻求调整方案的能动性。而凭借《易经》专长跻身殿试榜眼、进而获任日讲官的经历，则凸显出“通经致用”理念在清初选官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任职期间，孙在丰通过为帝王讲经、主导《明史》本纪纂修、参与《日讲易经解义》纂订等要务，参与官方正统文化叙事与王朝意识形态灌输；其与座师颜光敏、同年徐乾学等人构建的学缘与政缘网络，更成为支撑仕途发展的重要依托，完整呈现出清初汉族文臣“以学致仕、以仕弘学”的进阶逻辑。

在文学交游的层面，孙在丰展现出清初士大夫兼具家国情怀与文化担当的形象。孙在丰依托官方学术工程参与文化整合，为康熙朝的文化统一提供了正统性。在地方与家族层面，孙在丰主导族谱纂修、捐清俸修葺宗祠、提携胞弟入仕，不仅有效巩固了菱湖孙氏的家族凝聚力，更推动该家族从地方望族逐步进阶为仕宦名族，体现出士大夫以仕兴族、以族固乡的社会功能。而与纳兰性德、孔尚任的文学唱和，以及对李清、冒襄等前朝遗民的包容与交往，则突破了康熙近臣身份的隔阂，展现出以学术与诗文为纽带的士人意识，为理解清初遗民与新朝文臣身份矛盾下的文化传承脉络，提供了极具重要意义的研究个案。

治河实践是孙在丰生涯的重要转折，其提出的“开新不如循旧，筑高不如就低”治河理念，并非对传统方案的简单调整，而是根据下河地区“低洼易涝”的地理特征形成的务实策略，蕴含着顺应自然水势的治理哲学与体恤民力的人本关怀。但这一具备技术合理性的方案，最终沦为“明索党争”的牺牲品。康熙皇帝虽曾认可其纾解民困的方案，却终因权衡朝局势力而选择政治平衡，导致工程受阻、孙在丰遭贬。即便孙在丰的治河主张符合实际需求，也极易在党争漩涡中被裹挟牺牲，文臣身份在政治博弈面前的脆弱性尽显。

孙在丰壮年赍志而歿、功绩被淡化、著作散佚^[42]的结局，更折射出其被忽视的悲剧属性。在《清史稿》等史籍的叙事中，他被简化为“下河之争”的参与者，其学术贡献、家族实践与文学价值多被遮蔽。通过整合《菱湖孙氏族谱》《孙阁部诗集》等文献、私人诗文与河工档案，试图突破官方记载的单一视角，以求还原历史人物的多元面向。对孙在丰学宦经历的考察恰恰是打破传统历史叙事扁平化、构建多元生动历史图景的关键，这类被忽视人物的抉择与困境，承载着王朝制度运行、权力争斗与文化传承的丰富时代信息，是理解康熙朝政治细节变迁的重要个案。

孙在丰的生命历程本质上是清初汉族文臣在康熙朝初期的命运缩影，他们既凭借学识与能力在科举、学术、实务领域寻求作为，试图践行“经世致用”的理想。又始终受制于党争政治与帝制局限，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宿命。对孙在丰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康熙朝治河文臣与江南士人家族研究的空白，更为探析清初政治、文化与社会逻辑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注脚，其方法论意义与史料整合价值，对后续清代人物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孟昭信：《罢黜明珠与争取江南士大夫》，北京：《史学集刊》，1990年第1期，24-31页；
- [2] 王英华：《康乾时期关于治理下河地区的两次争论》，北京：《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76-85页。
- [3] 上海图书馆、孙在丰、孙人龙：《孙司空诗钞》，上海：上海图书馆，DOI：STGJ032488（索书号：线普407856-59），1746年刻本，孙司空行状。
- [4] 上海图书馆、孙宪章：《菱湖孙氏家谱》，上海：上海图书馆，DOI：STJP000786（索书号：JP263），1940年。
- [5] 上海图书馆、孙在丰：《孙阁部诗集》，上海：上海图书馆，DOI：STGJ098330（索书号：线善T10458-59），

清康熙稿本。

- [6]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7] 中华书局、刘承幹：《清国史嘉业堂钞本全十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 [8] 刘希伟：《清代科举冒籍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 [9] 梁志平：《定额制度与区域文化的发展——基于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学额的研究》，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
- [10] 梁志平：《清代学额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
- [11] 赫舍里牛钮、孙在丰等：《日讲易经解义》十八卷，清康熙二十三年内府刊本。
- [12] 戴璐：《吴兴诗话》，湖州：民国刘氏嘉业堂刻本。
- [13] 周青民、黄馨慧：《“纳兰性德与东北”研究综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1-7页。
- [14] 蒋良骐：《东华录》，乾隆七年武英殿刻本。
- [15] 贺长龄、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清光绪十二年武进盛氏思补楼重校本。
- [16] 傅泽洪、郑元庆：《行水金鉴》，清雍正三年淮扬道署喻义堂刻本。
- [17] 钱仪吉：《碑传集》，清道光六年刻本。

Between Linghu and Xiahe: A Study of Sun Zaifeng, a Civil Official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Liu Jinsuiyue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China)

Abstract: After a century of accumulation, research on figures of the Qing Dynast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rehensive. However, Sun Zaifeng, Vice Minister of Rites during the Kangxi reign, has long been overlooked in academic circles, with insufficient attention paid to his life experience, family background, and official career throug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Entering officialdom via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un Zaifeng became a close minister of Emperor Kangxi, holding key posts such as Bachelor Attendant-Reader, Vice Minister of Works, and Vice Minister of Rites. He witnessed numerous political events in the early Kangxi reign. Later, due to his involvement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Xiahe Project, he was embroiled in the "Mingsuo Factional Struggle" and was eventually dismissed from office in the river conservancy case.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this neglected early Qing civil official not only helps restore his historical role but also provides a vivid footnote to th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Kangxi reign by taking his academic and official career as an entry point.

Keywords: Sun Zaifeng; the Xiahe Dispute; Kangxi reig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figure study